



论改革成本

□ 王东京

我在本专栏曾发表《改革40年回望》，该文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对中国改革历程作了粗线条勾画。改革今天已进入攻坚期，未来改革该怎样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要削减制度性成本”；并强调“要做好为改革付出必要成本的准备”。我理解，改革需从制度成本与改革成本两个角度谋划，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改革方法论。

顾名思义，所谓制度成本不是生产成本，而是交易成本；具体到改革层面，则是指体制运行的交易成本。我们知道，任何一种体制运行都是有成本的。用计划配置资源会产生交易成本，用市场配置资源也会产生交易成本，而一种体制是否需要改革，直接判据就是体制运行成本的高低。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说到底还是计划配置资源比市场配置资源的成本低。

马克思早就指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要相适应。这是说，若一个国家出现了不可调和的阶级冲突，表明上层建筑已不适应经济基础，此时就应变革社会制度。从体制层面讲，若一个国家体制运行成本过高，表明体制已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降低体制成本，就得进行体制改革。

是的，体制是否改革需看体制成本；而体制怎么改，则要看改革成本。何为改革成本？简单讲是由改革产生的交易成本。改革要变革体制，势必要对现存的利益关系作调整，在有人受益的同时，也难免会有人利益受损。受益者支持改革，受损者却可能反对改革。为了减少改革阻力，就需要去说服、协调、安抚那些利益受损者，而由此产生的交易费用，便形成了改革成本。

应该追问的是，体制怎样改为何要看改革成本呢？对此我们不妨从以往的改革实践中去寻找答案。举世公认，迄今为止中国的改革有三大特征：一是以分领域改革为主，率先从农村突破；二是以渐进式改革为主，分步推进；三是摸着石头过河，不断试错。想问读者，我们的前期改革为何会具有上面三大特征？我的看法，这一切皆与改革成本有关。何出此言？让我分别作解释。

在我看来，中国改革率先从农村突破，是因为土地承包的改革成本低。读者想想，将土地承包给农户，农

民可以受益而其他入未受损，他人也就没有理由反对。这种无“负外部性”的改革，经济学称为“帕累托改进”。既然是帕累托改进，改革成本当然会低。事实确也如此，从1979年到1982年，短短3年土地承包就推广到了全国。

再看渐进式改革。中国选择渐进式改革，其实也是因为改革成本。说得明确些，是改革成本太高无力一次支付，只好分期支付。举国企改革例子。要将国企改造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那么就得允许企业减员增效，可改革之初我们不仅未建立社保体系，劳动力市场也未开放，企业要是从减员下手，阻力可想而知，改革成本一定会很高。

正是高成本约束，国企改革所以不得不分步推进。现在回头看，当初政府从放权让利起步，先让企业搞承包经营，然后进行公司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再到今天实行“混合所有制改革”，这样一步步深化，不过是在分摊改革成本。由此想多一层，不单是国企改革，诸如价格体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外贸体制改革等皆采取渐进方式，归根到底也是为了分摊改革成本。

是的，改革成本高，改革就应该渐进。可改革为何要摸着石头过河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某些领域改革成本不仅高，而且还具有不确定性。由于事前无法对改革成本作预估，逼不得已，改革只能边改边试，方向改对了继续改，方向没改对就退回来再作新的尝试。

以政府机构改革为例，去年机构改革大获成功，我认为以往改革反复试错出的结果。早在十八大前，我们已经改了7次机构，可令人遗憾的是，每次改革后皆出现了机构越简越臃肿、冗员越减越多的怪象。究其原因，是行政审批权在背后作祟。有鉴于此，十八大后中央釜底抽薪，大手削减行政审批。审批权小了，改革成本也就低了，于是才有了本次机构改革的完胜。

写到这里，读者应该明白以往改革为何会有三大特征。事实上，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也可从体制成本与改革成本的角度去领会。如果说以往改革主要是分领域、渐进式和摸着石头过河，而全面深化改革则主要是突出系统性和顶层设计。分领域改革八仙过海，改革往往不平衡，从而导致体制出现短板，而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补短板，以进一步削减体制成本。

再从改革成本角度看，经过多年分领域改革，那些容易改、好改的都改了，现在剩下的是难啃的硬骨头。随着改革难度加大，改革成本升高，部门改革动力在递减，甚至有问题部门已不愿再改。然而问题在于，若不打通改革最后一公里，整个改革就有可能前功尽弃。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做好为改革付出必要成本的准备。

最后来说顶层设计。全面深化改革是系统、协同性改革，改革要系统、协同，当然离不开顶层设计。不过读者要注意，顶层设计并不排斥基层试验，前提是要把握好顶层设计与基层试验的边界。两者的边界何在？总的原则是：但凡不存在负外部性的改革，应鼓励基层试验；而具有负外部性的改革，则必须由中央顶层设计。



“艰难困苦能使我们的事业成功”

□ 杨英杰

核心阅读

我们不仅不会放慢开放的步伐，反而会通过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请进来走出去并举，使中美双方企业努力在全产业链深度融合，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结成利益共同体，让两国人民真正受益，“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那些不得人心的做法注定不会长久。

美国1939，中国1224，日本487，德国368，英国262，印度260，法国258，巴西206，意大利193，加拿大165。

回望2007年的世界经济，中国经济总量仅相当于美国的23.7%、日本的75%。而10年之后的中国经济总量则增长为美国的63.1%、日本的25.1倍、德国的33.3倍，以及分别相当于英国、印度和法国的约4.7倍，巴西、意大利的约6.1倍，加拿大的7.4倍。

在经济总量大幅跃升的同时，中国产业结构也在不断优化，在全球产业链布局中渐进优化。这就表明，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强的可持续性，这也是个别国家制造“中国威胁论”的深层次刺激因素。而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即源自中国制造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中的持续提升。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之后，中国在全球产业体系分工中的地位呈现出“三步走”的态势。第一步，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主要以“三来一补”，低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第二步，加入WTO之后，随着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发生，高科技类外资企业逐渐加大投资，成为中国出口的主力军，中国企业则在“干中学”中成长；目前在向第三步转换，即中国的高科技企业正逐渐崛起，中国的制造业加速升级换代，极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替代外资成为出口的主力，而美国所担心的正是我们发力的第三步。无需多么高深的数学公式即可理解，两大经济体在全新领域中所进行的高度同质化的产品较量，必然会产生摩擦和矛盾。

再看美国大谈特谈的贸易逆差。一个国家之所以有贸易逆差，是因为此国有“顺差”的内容。甘蔗没有两头甜。对美国来讲，既想得到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收益，还想要有竞争力下降的行业之劳动力的充分就业，这就有点贪心不足了。美元之所以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实得益于国内低端产业的外流，美国可以将更多资源优先配置于比较优势产业，从而保持其高科技产业、金融服务业等优势行业在全球的领先地位。如果美国真想通过所谓“贸易战”的方式消除逆差，为何重点打击的反而是中国的高端制造业领域，甚至不惜伤及产业链上的本国企业？

美国是“顶庄舞剑，意在沛公”，其真实目的不在于所谓降低贸易逆差，而是要阻止中国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这一点，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更直白而言，即使是我们开启“买买买”模式，彻底消除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对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及高端制造业，美国仍然会采取各种手段予以打压。可以说，中美贸易摩擦的核心不是所谓贸易逆差，这只不过是一个遮人耳目的幌子而已，以求得到不明真相的中国民众的支持；中美贸易摩擦的核心处在于美国政府要通过贸易摩擦乃至贸易战的方式遏阻中国高端制造业的发展。

世界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技术引进对一国GDP（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至关重要，经济学家们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丹麦裔经济学家雅各布·马德森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对IT泡沫、房地产泡沫以及全球金融危机做出准确预测的学者，他曾经使用专利指标和重新定义的TFP（全要素生产率）指标，构建了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在1870—2004年间的数据库，检验了国际贸易所产生的技术溢出与TFP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TFP增长与技术引进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1870—2004年间，按5%的折旧率计算，OECD国家的技术引进增加了386%，技术引进带来的TFP增长率为93%。各国技术溢出与TFP增长率的变化是一致的，TFP增长最强劲的国家（如美国、日本和法国）也是技术引进增长最多的国家。

通过技术引进，发达国家才有今天的科技发展和经济增长。但个别国家得

了健忘症，很容易忘记历史，忘记了别国的科技、人才对本国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的重大贡献。历史上的中国，四大发明为推动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个别国家看到中国发展了，特别是科技创新突飞猛进，就坐不住了，通过各种市场的非市场的、台下的手段阻挠中国的技术引进，甚至对留学生的规模、研究领域都作出了限制，实在是让人不齿。好在中国人是不怕打压的，我们现在的条件相较于创造“两弹一星”的时代，强的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实现科技强国的梦想是任何人也遏制不了的。

扎扎实实干自己的事

邓小平说过：“中国人有自信心，自卑没有出路。过去自卑了一个多世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站起来了。庞然大物吓唬人，中国人不怕。抗日战争打了八年，抗美援朝打了三年，我们有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传统……我相信，在外国的侵略和威吓面前，我们的人民不会怕，我们的子孙也不会怕。”面对中美贸易摩擦，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关键是要立足于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少说多做，埋头苦干，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才是社会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问题意味着发展的新空间、改革的新目标。中国广袤的地域，地区发展的不均衡所形成的自然“压差”，为我们的改革提供了宽阔的回旋余地，中国经济的韧性亦由此而来。形势愈严峻，我们的思想愈要更加解放，改革愈要更加深化，开放愈要更加扩大，制度创新愈要加快推进。工作千头万绪，如下围棋，紧要处只是一两手便决定了全盘的胜负。着眼当前和长远，需紧紧抓住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牛鼻子”，牢牢抓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性工程不放松，对内持续全面深化改革，对外更大幅度推进开放。

第一，继续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但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一带一路”为全球提供新的公共产品，释放各国发展潜力，本质是实现经济大融合，为推动世界发展注入强大动力。我们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原则，顺应人类社会和平发展的大势，本着为世界经济持续增长提供新动力，为世界更加普惠平衡地发展、贫富差距鸿沟的弥合提供新的广阔机遇，继续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第二，继续推进国内基础设施建设，为稳就业作出实质性贡献。在消费和出口低迷不振的状况之下，如果没有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出现，将会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因此，在坚持结构性改革的同时，通过加快推进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重点弥补中西部基础设施历史欠账，对于稳就业、促增长具有重要作用。

第三，以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为抓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全面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和“两个毫不动摇”，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真正实现政企分开，这是解决政府债务社会化欠账、对于稳就业、促增长具有重要作用。

第四，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和民营经济发展。一是下更大力气降低民间资本进入重点领域的门槛，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二是进一步落实好减税降费措施，多措并举降低企业成本；三是畅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传导机制，特别是

在审慎监管基础上鼓励社会资本成立金融机构，深化金融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从根本上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第五，优先发展教育事业，不断提升人力资本。最近，有学者采用横跨1270年至2010年的英国经济数据，对英国经济率先突破马尔萨斯式增长陷阱进入现代经济增长的成因进行了研究。他们的研究发现，教育是推动英国经济长期增长的首要因素。过去740年英国的年人均GDP增长率是0.5%，教育贡献了其中的59%。作者认为，即使是制度因素也可能是通过影响教育或创新，进而间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人力资本累积是推动人类社会跨越经济增长各历史阶段的关键因素，可以说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认同。

近几年无论是学界还是社会上，有一种观点把中国人口红利下降归因于人口出生率的降低。中国人口红利下降固然有适龄劳动力相对不足的因素，但根本原因在于人口素质不能适应我国现代化发展阶段的要求，无法跟上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无法适应经济转型的需要，劳动力出现结构性匮乏。我国的工业化已经处于中后期阶段，而人力资本仍处于工业化前期的水平。全方位加大教育投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创新教育模式，实现教育服务均等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性基础性工作，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性基础性工程。

最后，当下的国际社会，正面临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我们有责任为解决全球问题提供中国智慧和方案。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主旨演讲中所指出的，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未来之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中美贸易摩擦非短期能够彻底解决，这一摩擦将会一直伴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而持续存在，或大或小、或激烈或缓和。如何稳妥管控双方之间的分歧，考验着中美两国的智慧。一方面，美方要真正认识到，通过打压的方式遏阻中国的制造也升级甚至现代化进程，无异于痴人说梦，中国只会愈压愈强愈挫愈奋。在这里，我们要“感谢”美方的所谓极限施压，这种“压力测试”会帮助我们找到发展的不足、发现体制机制的短板，通过此种方式倒逼我们的改革进一步全面深化，亦不失为一件好事。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清楚美国政府的真实企图，我们绝不会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我们深知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我们不仅不会放慢开放的步伐，反而会通过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请进来走出去并举，使中美双方企业努力在全产业链深度融合，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结成利益共同体，让两国人民真正受益，“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那些不得人心的做法注定不会长久。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特别指出：“艰难困苦给共产党以锻炼本领的机会，……你要是没有碰到那个坏事，你就学不到对付那个坏事的本领，所以艰难困苦能使我们的事业成功。”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发展的每一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必定会面临这样那样的风险挑战，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只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四个自信”，立足于做好自己的事情，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无论经历多少次狂风骤雨，中国经济的大海依旧在那儿！经历了5000多年的艰难困苦，中国依旧在这儿！面向未来，中国永远在这儿！

对处于中美贸易摩擦此时此刻的我们，重温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的一段话亦极有必要：“亡国论者看敌人如神物，看自己如草芥，速胜论者看敌人如草芥，看自己如神物，这些都是错误的。我们的意见相反：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